

21世纪经济学专业高等院校系列教材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主编 / 赵 津

副主编 / 王玉茹 张东刚

南开大学出版社

ZHONGGUOJINDAI
JINGJISHI

21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系列教材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主编 赵津

副主编 王玉茹 张东刚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经济史 / 赵津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2

ISBN 7-310-02479-6

I . 中... II . 赵... III . 经济史—中国—近代
IV . 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62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311 千字

定价:1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前 言

任何正规的专业教育都应包括史的内容。当今经济类专业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心,作为每个经济学人必备的基础知识,经济史教育面临更新的挑战。

多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的体例难以走出编年体的老路,与中学历史教材内容多有雷同,因此常常使学生感到重复和厌倦,不仅影响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使学生忽略了历史与理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两个基础人才培养基地,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深感责任重大。多年来始终致力于教学改革,继 1999 年出版了研究生教材后,又在 2000 年召开的“展望 21 世纪的经济史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本科生教学大纲——将近代经济史教材改为专题论述的体例,得到了与会同行的支持。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几年的编写和试用而形成的。

本书以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以近代经济史实为依据,以改革开放的需要为切入点,将 1840 年~1949 年这 109 年间的经济发展史划分为 12 个专题,专题的内容涉及近代经济的各个主要方面,如工业、农业、金融、外贸等,另外增加了资源、城市、产业结构、市场化、国民收入分配等与经济理论和当前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增加了政府职能方面的内容,从制度的角度引导学生全方位地了解经济现象及其根源。为避免专题论述缺乏时间顺序的概念,本书专门设计了一章,将近代的 109 年作了纵向描述和阶段划分,并且在其他章节的专题论述中尽可能地体现时间概念。为了便于读者作深入探讨,本书各章提供了很多数据和参考文献。总之,本书针对经济类专业人员了解经济史的需要,体现了经济史对理论研究的基础作用和对当代经济改革的借鉴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经济史与经济学	(2)
第二节 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	(14)
第一节 中国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1840年~1911年	(15)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12年~1936年	(19)
第三节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停滞阶段:1937年~1949年	(23)
第三章 人口与资源	(26)
第一节 人口数量及其分布的变动趋势	(27)
第二节 土地资源及其利用	(39)
第三节 矿产、森林及水资源	(49)
第四章 传统农业的转变	(66)
第一节 土地制度的变化	(67)
第二节 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78)
第三节 农村商品化程度的考察	(87)
第五章 工业的发展道路	(100)
第一节 近代工业的兴起(1840~1894)	(101)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曲折发展(1894~1949)	(108)
第三节 近代手工业的发展	(118)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	(128)
第一节 不同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比重	(129)
第二节 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转移	(141)
第三节 影响产业结构的主要因素	(148)
第七章 城市近代化进程	(160)
第一节 近代城市的崛起	(161)
第二节 近代城市的发展	(172)
第三节 近代城市的辐射功能	(181)
第八章 政府职能的转化	(188)
第一节 工商管理机构的改革	(189)
第二节 近代经济立法的演进	(197)
第九章 金融市场的形成	(213)
第一节 金融体制的变化	(214)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构成	(224)
第三节 金融市场的特点与作用	(236)
第十章 对外经济关系	(244)
第一节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	(245)
第二节 进口与出口贸易	(258)
第三节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274)
第十一章 国民收入分配	(280)
第一节 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	(281)
第二节 国民收入剩余向资本的转化	(290)
第三节 资本生成机制的障碍	(300)
第十二章 市场化测度	(305)
第一节 区域市场的划分	(306)
第二节 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	(316)
第三节 相对价格运动	(323)
第四节 总需求变动的一般趋势	(332)
后记	(342)



第一章

绪 论

任何正规的专业教育都应该包括史的内容。在经济学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中，经济史属于必备的基础知识。不仅如此，经济史的知识空间是广阔的，对研究者能力的锻炼是全面的，研究成果给人的启发往往非常独到和深刻。因此，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经济学家，无不对经济史学的重要性给予高度评价。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第一节 经济史与经济学

一、经济学家谈经济史

关于经济史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没有谁能够比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评价更有说服力了。

西奥多·舒尔茨指出：“物理学的知识主要建立在受控制的实验上，然而，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依靠分析存在于各个天体的历史记载中的差异而来，虽然经济学家也渴望和物理学家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的原因。”^①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晚年在总结治学经验时指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结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在这三门技术中，熊彼特认为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基本学科。因为，“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他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学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②

^① 《世界经济》编辑部，《荣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2页。

^②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8~29页。

道格拉斯·C. 诺斯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发表演说：“经济史探讨的是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演变过程。该领域的研究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以往的经济活动作出新的说明，同时，通过提出某种分析框架还可以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这种新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理解经济的变迁。……在求得对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实绩理解的漫长道路上，我们才刚刚出发。今后的研究就是要把依据历史证据得出的新假设具体化，这样做不仅能提出一个能够解释历史经济演变的理论框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丰富了经济理论，使它能更有效地对付广泛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认识范围。希望就在前头。诺贝尔委员会指出了希望之所在，这对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是一个巨大的鞭策。”^①

二、经济史与经济学：分与合

与其他学科的发展规律一样，经济史学科的独立也是人类认知深化、学科细分的结果。

从经济学萌生到政治经济学创始，经济史学与理论经济学是一体的和统一的。现代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将抽象的理论推导和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著作都同时包含了两者，既有抽象的基本原理的分析演绎，又有大量历史事实和统计资料的叙述与分析。马克思继承斯密开创的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合的传统，并且运用历史辩证法予以改造和创新，使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有机结合在一起。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以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及对其分析演绎为基础，形成了宏大的理论体系。

自大卫·李嘉图以后，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开始分离。李嘉图注重经济学的演绎推理，而忽略了历史的分析归纳。此后，经济学内容不断丰富，其结果是不断使一些内容从理论经济学中分化出来，形成新的独

^① 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实绩的历史透视》，（美）《美国经济评论》1994年第6期。转引自赵德馨，《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773页。

立的学科，经济史学科就是其中之一。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日益分离，二者发展成为相互独立的专门学科，这是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分离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理论经济学界大部分学者只注重理论的演绎而忽视历史的归纳；而经济史学界大部分学者则将史的研究本身作为目的，忽视了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抽象出理论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史研究变成了专门对历史资料进行发掘、分类、编纂和叙述的学问，似乎与经济理论毫无关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新经济史学派重新提倡“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熊彼特、诺斯、舒尔茨、弗里德曼、希克斯、库兹涅茨、刘易斯等一批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以探索人类历史上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目的，运用计量分析、制度分析以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以崭新的视角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新经济史学不仅给经济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给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再度结合起来。

三、经济史与经济学：源与流

理论如果脱离了历史与现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6世纪～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他全部理论体系的基本依据。恩格斯早在1886年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①同样，亚当·斯密也是先从历史中抽象出其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范畴和原理，如分工、市场，分工导致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制约分工程度等，然后专门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在史实中抽象出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解释了其形成的原因，以便历史地证明他的分工与市场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指出：“斯密不仅在对经验的强调上，而且在那贯穿于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的

^①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页。

随自然发展阶段而发展的主题思想上,都是一位历史经济学家。”^①

新经济史学重申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促使经济学研究视野的回归,其结论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新经济史学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历史考察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有关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考察大大拓宽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此外,新经济史学的研究还将公共选择、社会知识、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因素纳入了经济学家的关注范围,扩展经济理论的分析空间。诺思成为“产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正是新经济史学这种作用的体现。

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础。任何理论都来自实践。经济理论更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实践的总结。经济理论由于其自身系统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一旦形成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局限在理论体系内,很难跳出原有框架。因此,无论是开辟新领域的创新,还是修正旧理论的创新,都只有从实践的材料出发进行探索,才能完成。熊彼特指出:“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②

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来说,经济史就如同生命之源。理论既可能被证实也可能被证伪,然而为经济理论提供经验和事实的经济史,具有史实意义上的客观性,因此它是经济学理论更新假设的来源。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③

第二节 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有两个问题是关键:一是选题,二是研究方

^① 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②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22页。

法。经济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即治史不必拘泥某种特定的方法，不同的问题可用不同的方法，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论证。吴承明先生指出：“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在方法论上不应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① 研究经济史，唯一的根据是经过考证被认为可信的史料，其他的都是方法问题。所以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被应用于经济史研究。

一、历史学的方法

经济史的特点首先是个“史”字，要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一切从史实出发。历史研究首先是求实，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首要原则和基本方法，须臾不可或离。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讲，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和训练十分必要。因此，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学的方法，尤其是史料学和考据学。

史料考证是治史的根本。史料的范围很广，包括文献、文物、口碑等方面。由于史料也是人为的，难免有偏差甚至失实。所以，史料不等于史实，需要借助考据学，通过训诂、校勘、辨伪、类推等方法，“考而后信”，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因此，史料学与考据学紧密结合，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胡适对古代的做法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八字原则，这是对考据学乃至整个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贡献。

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料学和考据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史领域，整理出版了很多重要的大型史料，如农业、工业、手工业、铁路、航运等大型行业史料汇编；档案整理的成果就更多了，如商会档案、银行档案、钱庄档案、地区档案、名人档案和著名企业档案等。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国开展的重修地方志工作，其规模之大，动员之众，成果之丰，举世罕见。所有这些，为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和当代经

^①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济史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具有相对性。虽然我们不能达到认识的终极,但能不断地接近它。西方史学至今没有离开实证方法,即使是一部用纯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仍然先要考察其所在资料尤其是数据的正确性。包括欧美在内的国外学者对史料的关注和利用程度,并不亚于我们,特别是日本学者,在史料收集整理方面投入的功力,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经济学的方法

经济史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叙述史实,史实本身并不是史学,而仅仅是史学的原料,就如同砖瓦沙石对于高楼大厦,仅仅是建筑材料而已。现代史学方法论认为,仅仅依靠史料做不出真正的历史研究,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料,对历史的过程进行分析和解释。

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决定着用什么观点考察经济的历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阐释经济的历史。

吴承明先生多次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思维的方法或分析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① 凯恩斯也曾说过:“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②

将经济理论的范畴、体系作为研究经济史的工具的做法十分常见,比如,借助商品、货币、劳动力以及原始积累等范畴,研究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运用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范畴,分析近代中国市场问题;运用发展经济学二元论以及比较的方法,比较西方与中国的差异;运用周期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波动,等等。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在他主编的六卷本巨著《欧洲经济史》中,就运用了当代经济理论,尤其是凯恩斯的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6页。

^② 《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页。转引自《吴承明集》,第316页。

赵德馨先生提倡发展经济学的方法,指出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的理论结晶。这一理论重视长期趋势,注重比较研究,创立了二元经济论,中心论题是如何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研究重点是不发达国家怎样摆脱贫困而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行列,因此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是近年来在经济史研究中应用较多的理论工具,储蓄与投资、人口与产出这些范畴在经济史论文中经常出现。

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史,形成了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诺斯的理论由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以产权理论为核心。诺斯认为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变迁的条件和动力是新经济史学的主要特点。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中国的国情,近几年已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

总之,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应该说是最基本和最常见的。至于选择哪种理论,要根据对自己研究的问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的某一点,也可以在研究一个问题的过程中选用几种理论,只要能自圆其说。需要强调的是,运用理论的目的是掌握工具,启发思维,而不是用史实证明理论。

三、计量学的方法

经济史因其研究目的是经济规律,所反映的现象应该是大量的和普遍的,因此,计量的问题就十分突出,关系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吴承明先生指出:“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这就可以破许多假说,立论才有根据。”^① 刘佛丁先生也曾强调:“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如果不能用明确的数字序列来加以表示和衡量,而只能用一些‘较多’、‘很多’、‘几乎等’不确切的概念来描述,那只能说明我们对它的了解是肤浅的,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科学的阶段。”^②

传统史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即完全依靠文献资料中

① 吴承明,《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② 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对个别事物的记述或零星的数字，以举例说明的方式，然后加以概括，作出的定性判断往往模糊不清，容易以偏概全。在如何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分散到综合，由微观到宏观方面陷入困境。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计量经济史学按照经济学的范畴，从经济分析出发，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已经占有的原始数据加以重组和归纳，对于文献中没有直接计量而又必不可少的数据，则从已知的变量中根据经济学原理中已判明的函数关系加以推算，使之能够从宏观上和总体上来描述与认识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若数据齐备还可按照模式，用反事实度量法，对影响某一事物的各种内在因素作定量分析，从而可以区别这些自变量对某一因变量影响的相对重要性。计量史学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检验以往历史研究中那些未经计量的定性判断，使那些符合或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得到验证，将错误的结论加以纠正，并作出科学的结论。

计量的方法需要以大量的、系统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所以对近代和当代经济史研究更为适用。中国学者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用计量的方法研究货币和价格的居多，一旦有新的资料被发掘和整理，这一方法的使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然而计量分析方法一般适用于研究生产力，不适用于生产关系，只反映量变，不反映质变，只追求数量的连续性，忽视突变。以函数关系代替事物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说明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已被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制度等因素，则不能用计量来精确表示。因此，计量分析法应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是理论创新。

四、地理学的方法

“史地不分家”，经济史就更是如此。没有谁能离开自然条件来谈经济发展，而且生产方式越是落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就越明显。因此，地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西方学者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部分，或分为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三部

分。自然地理学包括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人文地理学则包括人种、人口、聚落、社会、宗教等。

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其他分支还有城市、区域、生态地理学等。其研究领域与经济史密切相关。

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历史，很早就有人作过尝试。今天当我们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地理环境和生态问题再次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经济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更需要结合自然条件做长期的观察。法国年鉴学派关于长时段历史的研究，就是从地理环境入手，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在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地理学的问题就更多了。区域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区域的方法实际是地理学方法的引申，只是更为宽泛了。目前水利史、土地利用、人口移动、文化、生态史等都纳入了区域史的研究范畴。著名汉学家、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指出：“中国社会容量巨大，也许与其说时间的差异性大，不如说空间的差异性更大。”^① 斯波义信引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探讨长期性的生态变迁，重点也是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关系。

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始终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五、社会学的方法

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不是同步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在非经济因素中，政府和文化是最大的两项，而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史研究不能回避非经济因素，在这方面，社会学的方法独具优势。

社会学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涉及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家族、阶层、婚姻、社会组织、消费习俗、城市化、政府的作用等。这类问题不能完全用经济理论解释，但又是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所以借助社会学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①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社会学方法的特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认为每个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注重各民族、地区演进的比较研究，重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引入社会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重视社会调查，强调调查的客观性，积累了一套科学的调查方法。

法国的社会学一向发达，因 1929 年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的“年鉴学派”，把结构主义引入史学，主张从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上多层次地研究历史，用分析法代替传统的叙事法。

如经济增长问题，过去用线性的方法，现在则用结构的方法来研究。结构主义属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盛行于西方经济学界，基本上代替了过去的线性增长概念。在历史学界，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也对结构主义大加倡导，用结构主义代替编年史和线性发展的理论。结构主义的方法包括总体观察、多元时间、多层面分析的特点，适用于经济史研究。社会学强调多样性，与典型性研究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现在国际史学界在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同时，认识到世界从古到今都具有多样性，东方与西方从来都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经验并不能作为普遍规律。

六、比较研究的方法

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都有所采用。之所以在这里单独加以强调，因为它是目前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普遍采用、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之一。

中日比较、中美比较的成果虽然都已出现，但占主流的还是中西比较。中西比较研究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现状；二是制度性的比较，即比较双方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精英等的作用。这种比较的困难在于中西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同，没有一个通用的评价标准以及统一的综合指标。过去西方学者多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缺少了什么，或多了什么阻力，以至于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实际是把欧洲的经验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最